

勿忘国耻纪实

丛书

何玉茹

狼烟白骨

——侵华日军华北大扫荡

花山文艺出版社

06

勿忘国耻纪实丛书

狼烟白骨

—侵华日军华北大扫荡

何玉茹



花山文艺出版社

内容提要

本书选取日军侵略中国的华北平原这一侧面，揭露、论说了日本法西斯的残暴本性和种种的血腥罪行。华北平原原本美丽、富饶、资源丰富，但日本侵略者曾在此疯狂地实行“三光”政策，使我们的家园在很长时间里创伤累累，尸骨成山，血流成河。中国人民决不能忘记这样一段屈辱的历史，要在对历史的郑重的回望中，把今天的中国建设得愈加富足、强大。本书用平实而有趣味的叙述对翔实的历史资料作了较全面、细致的组合，使日本法西斯对华北平原的侵略罪行更清晰、完整地展现在读者面前。

主编：王维玲 策划：方 殿 陈 新

勿忘国耻纪实丛书

狼烟白骨

—侵华日军华北大扫荡

何玉茹

责任编辑：陈 新 翟建文 装帧设计：愚 人

美术编辑：宋丕胜 责任校对：李桂香

出版发行：花山文艺出版社（石家庄市和平西路新文里8号）

印 刷：河北新华印刷一厂（保定市省印路102号）

经 销：新华书店

850×1168毫米 1/32 6.75印张 120千字 1998年7月第1版

1998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8,000 定价：9元

ISBN 7-80611-611-7/I·601

目 录

自序.....	(1)
1. 关于照片的联想	(3)
2. 关于冈村宁次	(7)
3. 灭绝人性的三光政策	(11)
4. 治安强化运动	(23)
5. 无人区	(30)
6. 酷刑	(37)
7. 解剖活人	(45)
8. 细菌战	(50)
9. 慰安妇	(54)
10. 奸淫暴行	(63)
11. 惨案中的老人、儿童	(69)
12. 华北劳工	(76)
13. 再说劳工	(85)
14. 在日本的中国劳工	(93)
15. 物资掠夺	(98)
16. 生意人的遭遇	(105)

17. 奴化宣传	(110)
18. 烟害	(116)
19. 日伪政府	(122)
20. 另一类汉奸	(132)
21. 伪军	(140)
22. 进城见闻	(147)
23. 艺人	(151)
24. 一位小学教师	(161)
25. 一位乡村少女	(167)
26. 我和姥姥	(182)
27. 日本见闻	(194)
参考书目	(212)

自序

日军侵华的历史早已成为过去，日军在中国犯下的罪行似也一天一天地变得遥远、模糊，尽管有相当多的目睹过那凶残罪行的中国人还存于世上，但在我们无缘目睹的一代年轻人的心上，那段漫长的屈辱究竟还有多少分量？即便是亲身经历了那段历史的中国人，谁又敢肯定他们不会渐渐地忘却，以至在日异变化、翻新的现实生活中全部地将历史抛掷脑后？

事实上，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处在历史的链条上，我们现实中的每一个人都可能不对历史作出有意无意的回望，即使是麻木的一望，那铁一般的历史也会给人留下冰凉的印迹。要紧的是，我们麻木或不麻木的心灵，该怎样去感受那历史的冰凉。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对着一堆日军侵华罪行的图片和文字，我的脑子里都是一片空白。我对自己的这种状态感到恼火，那血淋淋的屠杀，那残无人道的焚烧、抢劫，那老人、儿童、妇女无助的哭喊，难道一个专事写作的人竟无话可说？可是，时间一天天地过去，在铺开的稿纸前我仍是一派茫然。

后来，我将图片和资料放进书橱里，试图与它拉开距离，先写些写惯了的小说、散文。可是，想不到情况更加糟糕，一篇早

有构思的小说，此刻非但没有写作的感觉，连构思都已变得淡而无味。深夜，我坐在灯影下显得十分庞大的书橱旁，忽然感到，我其实是被沉重的历史震慑住了，在沉重的历史面前，我不可能再回到安详、从容的小说创作中去。我唯一可做的，只有重新面对历史，努力使自己与历史贴近，以从中寻找自己的感受，寻找自己的思考，寻找真正属于人类的精神家园。

我想到一位经历了唐山地震的老先生曾描述地震刚发生时的情景，他说，当时一派静寂，听不到一丝声息，就像整个世界死去了一般。我想我的“茫然”，大约与这“静寂”相类似，静寂过去，我的“寻找”便应该开始了。

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曾说：“就日本现代文学而言，那些最为诚实的‘战后文学’，……在亚洲地区，……对日本军队的非人行为做了痛苦的赎罪，并以此为基础，从内心深处祈求和解。我志愿站在表现出这种姿态的作家行列的最末尾，直至今日。”在对历史的惊愕的回望中，大江的话让我感到了几丝释然，即便不为了划分历史的责任，只因为一种精神的追寻，这回望也是值得的，尽管回望被侵略的历史需要勇气，需要心痛地正视一切不堪回首的国耻、家仇。

1. 关于照片的联想

想来想去，我还是要先从照片说起。因为照片就像一扇历史的窗户，一旦打开，那扑面而来的血腥的气息就再也无法使我摆脱掉了。

我是解放后出生的，从记事起，华北平原就以美丽、富饶给了我永久的印象。我从小在这块土地上长大，清新的空气、一望无垠的绿野总是让我充满美妙的想像；善良的家人、温厚的乡亲又总是让我想像的翅膀自由而依恋重重。虽然从老年人那里曾多次听到过关于日本鬼子烧杀抢掠的叙说，但那久远的没有经见过的事情，于今天的美丽和富饶又有多少联系呢。

但照片这东西，第一次逼迫我将现实中的土地与历史靠近起来。

我无法想像，昔日的华北平原会是照片上的样子：到处是被烧成焦土的村落；举目可见被禁作的田园；日本侵略军寒光闪闪的刺刀；被残害的成千上万的中国百姓的尸体……

但我毫不怀疑这历史的定格，比起文字，也许这瞬间的定格，更可以使人们感受到一种客观真相。

a 幅：一个有居民 15000 人的村镇，被日军一夜间烧成了一片

废墟。

b 幅：被烧毁房屋的百姓无家可归，一位老人和一位妇女在寒冷的雪天逃亡，流浪。

c 幅：一排持枪的日本军人，正在朝被捆绑着的中国无辜平民当活靶子瞄准射击。

d 幅：两名日军拿了刺刀，正在向捆绑在木桩上的中国青年当刀靶练习刺杀，中国青年的衣衫被扒开，胸膛裸露。

e 幅：一名被日寇奸淫后的中国妇女又被剖腹而死。

f 幅：被日军残害的中国百姓的遗骨堆积如山。

.....

我说过，看过照片后的很长时间，我脑子里都是一片空白，我同时也不否认，空白中还夹杂有一种恐怖的感觉，就仿佛儿时反复做过的一个被魔鬼追杀的恶梦一般，那感觉叫人久久地惊恐和不安。

我想起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的一句话：“我同样也了解肉体恐怖对个人和群众的重要性。……因为被击败的对手在大多数情况下都对继续抵抗不抱任何胜利的希望。”我还想起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于受刑的人的分析：“一般说来，被判处刑罚的人这时完全被一种强烈的纯粹是肉体上的恐怖所征服，这种恐怖感是不由自主的，无法抗拒的，它压倒了这个人的全部精神实质。”我想像照片上手无寸铁的被害者，在日本法西斯的刺刀和枪弹面前，是一种怎样的惊恐无助、任人宰割的情景，他们的心里毫无疑问是充满了仇恨，但也毫无疑问，恐惧、无奈并不逊于仇恨。我曾听到过一个真实的故事，即一名日军举枪对准一个男孩时，男孩的母亲和众乡亲立时跪了下来，乞求他饶恕这个男孩。结果子弹擦了男孩的头皮飞了过去，男孩真的保全了性命。这名日军自然不能理解为良心发现，无非是在满足一种可以主宰另一个人的肉体的

欲望，饶恕与不饶恕，都可以是这种欲望的体现；而那跪下来的人们，在为所欲为的暴行面前，显然已不可能再有人的尊严，有的只能是简单的恨与怕，而恨与怕相比，又明显是多么地微弱可怜。

谈到尊严，我不止一次地想过，这一幅幅的照片是怎样拍下来的？那些拍照的日本兵士拿到自己充当刽子手的照片时是怎样的心情？人与人之间，真到了一种不讲尊严只有征服的地步，征服者难道就没有一丝心灵的不安？

无独有偶，最近美国出版的一本新书，书名叫《希特勒的自愿的刽子手——普通的德国人与大屠杀》，书中印有这样一张照片：一个德国士兵站在离一个怀抱孩子的犹太妇女不到三公尺的地方，正按照步兵操典的规范，举枪瞄准这个妇女。这德国军队屠杀犹太人的场面与日军屠杀中国人的场面是何等相似！但问题还不在于场面本身，而在于那德国士兵是要将这照片作为纪念寄给他在德国的母亲！

寄照片的行为或许比屠杀行为更令人感到震撼，就是说，日军在屠杀中国人时，不但可能没有心灵的不安，还可能是一种得意和自豪，就像德国军队把犹太人视为劣等民族一样，日军也同样将中国人视为劣等民族，既是劣等，就可以以优越者自居，就可以为所欲为，就可以将屠杀当成一种习惯，视本来反常的现象为正常，甚至从中生出惬意和自豪来。一位侵华的日本军医承认，他从中学时代就开始受到这样的教育：支那人是落魄的劣等民族，日本人才是伟大的；因为中国人是劣等人，所以才穷，所以才战乱不止。他们经常唱的一首歌是《马贼之歌》，其中有这样的歌词：“你去我也去，狭小的日本住腻了……”他们就这样日益被刺激着向往未来世界的幻想，日益形成着将侵略作正义的信念。倘若欲望再加上信念，很难想像世界的安宁还会有什么保障。

虽然道理已十分明白，但照片上人对人的屠杀却仍久久纠缠在我的心里。我无法忍受视人如猪狗的残暴行为，更无法忍受视这残暴为某种正义的欣然态度，他们尽可以有一千个为自己辩白的理由，但血淋淋的事实让每一个中国人都会在心里打上永远抹不掉的印迹，那是一种难以言说的屈辱感，就像一位母亲面对被无辜伤害的孩子时的感觉，她可以在后来的时光宽容伤害孩子的人们，但永远不会宽容那伤害本身，因为她心底深处的疼痛时时在提醒她：要为孩子争一份永久的人的自由和尊严。

2. 关于冈村宁次

提到日军侵华战争，特别提到日军在中国华北平原犯下的罪行，就不能不提冈村宁次。

《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里写道：

冈村宁次：1941—1945年8月历任华北方面军司令、第6方面军司令、中国派遣军总司令等职。在中国推进惨绝人寰的烧光、杀光、抢光的“烬灭扫荡”政策，对中国人民犯有滔天罪行。

日本的一些书刊也曾露骨地写道：

冈村宁次大将率领的华北方面军于1941、1942年进行大规模扫荡战，施行了中国方面称为三光政策的残酷战术——烧光、杀光、抢光。

日军在战争末期采取杀光、烧光、抢光的所谓三光政策，阻碍了解放区的成长。解放区的人口一时因此骤减一半。

这样的记载，大约已成为铁定的历史，再也不容有什么更改了。

1940年3月，冈村宁次从中国战场被召回日本东京，拜见了天皇和皇后。为奖励他侵略中国的功绩，天皇赐给他一个银质的带有皇室信章的大花瓶和3000元现金；皇后赐给他一个银杯和700元钱，并对他说：“长时奋战，实属辛劳，祝贺凯旋，望愈加自爱奉公。”

冈村宁次自是受宠若惊，或许正是这来自天皇、皇后的奖赏，为他后来的侵华罪行作了有力的铺垫，1941年4月，冈村宁次就由陆军中将升为陆军大将。

三个月以后，冈村宁次担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再次回到了侵华战场。

聂荣臻元帅曾回忆说：这个被称为“日本军阀三杰之一”的冈村宁次，曾是屠杀我东北同胞的有名的刽子手，他到华北一上任，便提出了“治安强化运动”，即所谓“三分军事，七分政治”，集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交通、特务为一体的“总力战”，对各根据地实行野蛮残酷的“三光政策”。他上台后的第一着棋，是立刻集中了五个师团、六个混成旅团，另有一部分伪军，共计七万兵力，首先向我北岳区举行了一次规模空前的大“扫荡”。

1942年4月，冈村宁次又集中4万兵力对冀南根据地大扫荡，同年5月1日起又以5万余兵力对冀中抗日根据地进行空前残酷的扫荡与清剿，同时以2.5万兵力扫荡太行区，9月起，又调集4万兵力对冀东进行大扫荡。

在扫荡中，日军肆意烧杀奸淫，涂炭生灵，仅冀中区在“五一”大扫荡中就有5万群众被杀害或被捕。

日军还强征几十万民工沿密云、平谷、蓟县、遵化、迁安等山区边缘挖成封锁沟，将长城线上直至封锁沟内的村庄全部烧光，

将群众全部赶走，制造了惨绝人寰的“无人区”。据统计，只在制造“无人区”的过程中，就烧毁房屋 3823000 多间，抢走粮食 96 亿斤，牲畜 248000 余头，屠杀的中国百姓不计其数。日寇甚至将杀死的中国人的耳朵割下来，用铁丝串起来按数领赏。他们还进行“割青扫荡”，每逢春夏之交青苗长起的时候，割青的铁蹄就践踏在绿色的田野上，连蔓菁、萝卜、南瓜苗也统统铲掉，使百姓只能像原始人一样吃野菜野果，住在冰冷的山洞和四处透风的草棚里。

自冈村宁次上任到 1945 年日寇投降，日寇在华北制造的惨案竟达上千起，残死在日寇屠刀下的中国人上百万，冈村宁次作为侵华的一号战犯，罪责难逃，理应得到人民的惩处。

可是，对冈村宁次，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却不顾民众的呼声，千方百计地包庇，最终给罪大恶极的战犯留了一条“遣返日本”的生路。

而冈村宁次本人对自己的罪行也极力推诿狡辩，拒不肯认罪，下面便是冈村宁次与审判长石美瑜的一段答问：

问：被告出任侵华日军总司令官，系奉命还是自愿？

答：军人以服从为天职，奉命不得不过来。

问：对所部屠杀放火等行为，被告是否知悉？

答：均不知道。担任总司令长官后，曾约束部下不得骚扰平民。

问：被告统制下的军队烧杀抢掠，应负什么责任？

答：不能负责。因总司令以下有方面军，方面军以下有军司令部，军司令部以下有师团部，直接作战行动由师团部实施，总司令与之相隔二级，故如有罪行，应由师团长负责，与我无关。

一边是拒不认罪，一边是纵惠包庇，作为中国人的蒋介石之流，当年的不抵抗政策已是写上了耻辱的一页，这时为了所谓

“今后的日中合作”，又让战争罪犯逃之夭夭，可说是耻辱之上的耻辱，连日本众多饱受战争灾难的人士都为此愤愤不平，日本的《大公报》曾报道说：“有的日本人认为，以德报怨的宽大方针，施于战犯是否妥当？如冈村宁次身为侵华日军的总司令官，乃理所当然战犯，如此战争祸首竟得免罪，留下军阀祸根实属有害民主主义的发展。”

比较冈村宁次的不认罪，我不由想起德国总统在纪念二战五十周年活动时，在波兰犹太人纪念碑前下跪的情景，那情景曾让世界多少人感慨和感动！一位德国作家也曾说，“我们干了谋杀的勾当，而且是系统地大规模地干的，我们卷入了一种令人恐怖的意识形态的狂热之中。由于这是事实，所以即使我们这些在后来长大的德国人也感到不安……”一位犹太作家则说，“大屠杀将永远是不能辩解的，也是不能说明的。”而冈村宁次岂止是辩解和说明，他的一名律师甚至为他歌功颂德，说他在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期间设法供给中国农民棉布，打击奸商，使民生安定。把一名罪恶累累的战犯，竟捧成了中国人民的救世主。

这样的信口雌黄也好，为了集团私利公然违背民意也好，事实总是事实，历史的真相是不容抹杀的，在堆成了山的中国人的尸骨面前，不要说中国人，就是冈村宁次本人，恐怕也该出一把冷汗吧。

3. 灭绝人性的三光政策

“三光政策”在中国可以说是妇孺皆知的，这不仅因为它有着千千万万个见证人，更因为它给中国人造成的肉体 and 心灵的伤害是永难消失的。

“七七”事变后，日军很快占领了华北，后来又向南攻占上海、武汉和广州。这种战线拉长的结果，虽满足了日军侵略的野心，却同时也增加了日本财政经济的负担，1937 年日本军费开支占到国家总支出的 69%，达 32.71 亿美元；1938 年军费占国家总支出的比例竟上升到 76.80%，达到了 59.62 亿美元。巨大的军费开支自使国力难以承受，日军却又绝不肯在侵略的道路上后退半步，因此，“以战养战”，进行战争掠夺，实行杀光、烧光、抢光的政策，于日本法西斯也就成为了必由之路。

日寇先是在占领区内抓捕大量劳工从事开采、生产等活动，把一车车煤炭、矿石、钢铁、布匹、粮食运往战争需要的地方，甚至掠夺华工到日本从事苦役。随着占领区人口的减少和生产能力的下降，日寇同时也加紧了对抗日根据地的疯狂抢劫，每到一地，见人就杀，见房屋就烧，见粮食、牲畜就抢，开始了灭绝人性的“三光政策”的实行。

我华北抗日武装力量对日寇的打击，也成为日寇实行三光政策的军事上的原因，在日本出版的《华北治安战》一书中，日军这样认为：“冀中地区是河北省中部的粮仓，在战略和经济上居于重要地位……，由于该地区已成为对缺乏农产品的太行山中共根据地供应、培养战斗力的基地，因此，……只要扼杀该基地，就会收到很大成效。”这无疑是日寇法西斯暴行的自供状。为破坏抗战力量，日寇还公然实行“大量减少人口”的残暴策略，对我华北抗日根据地进行了凶残的大屠杀，不但男人不放过，连老人、妇女、儿童也数以万计地死在了日寇的刺刀下。丰润县潘家峪村1703口人，就有1230口人被杀，1100多间房屋被烧毁，财物被抢掠一空。惨案发生后，一位记者赶到现场，目睹了日本法西斯犯下的暴行，写下一篇《屠杀现场视察记》，他这样写道：

翻过了一条山梁，我遥遥望见这群山环抱的山村。走进村头，招人注目的白粉墙上刷着三个大字“潘家峪”！展现在我眼前的尽是坍塌的房屋、瓦砾、灰烬。看不见袅袅的炊烟，看不见昔日的羊群和拾柴的孩子。我默默地向村里走去，过了村头石桥，桥旁有一个小岩洞，洞口塞满了苍绿的松枝。掀开松枝，使我吃惊地看到四个焦黑的女尸。

村里几处菜窖旁，还陈着不少具女尸，一个青年目击者告诉我说，这些都是年轻美丽的姑娘，是在鬼子把人们赶到屠场之前，硬拉她们去做饭。哪里是做饭，就是把她们拉到地窖里……一片女人的连声绝叫之后，日本兵爬出了地窖，点着几捆玉黍秸往地窖里扔。强盗们强奸了她们，用刺刀挑破了她们的下身，又用火烧烂她们的尸体……

石桥前就是潘惠林大院，这里就是屠杀场了。一进院门，眼前尽是尸体，恶腥的气味迎面扑来，宅门右首石槽上陈着